



贵州财经大学经济研究文库

民国武汉棉纺织业问题研究

(1915—1938)

刘岩岩 /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贵州财经大学经济学研究文库

民国武汉棉纺织业问题研究 (1915—1938)

刘岩岩 /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民国武汉棉纺织业问题研究: 1915 ~ 1938/刘岩岩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4

ISBN 978 - 7 - 5161 - 7557 - 6

(贵州财经大学经济学研究文库)

I. ①民… II. ①刘… III. ①棉纺织工业—工业史—研究—武
汉市—1915 ~ 1938 IV. ①F426. 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22543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卢小生
特约编辑 林 木
责任校对 周晓东
责任印制 王 超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6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4.25
插 页 2
字 数 239 千字
定 价 5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敖文蔚^①

1978年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教育和文化的迅速发展，各学科的进步日新月异，可谓文林舞凤，学海腾蛟。历史学也著述如山，观点竞异，理论丛出，发表的研究生论文应接不暇。

一腔浓情研纱锭，一手电脑敲佳音。四年前的夏天，当刘岩岩的博士学位论文《民国武汉棉纺织业诸问题研究》顺利通过答辩时，我作为他的导师自然感到高兴。现在，又获悉他的这篇论文即将出版，十分欣慰！

一

历史研究的成果，不仅是笔者与史实交互作用的产物，二者唇齿相依，不可分离；而且，研究生的毕业论文还是师生互动的结果。刘岩岩的这篇论文，选择武汉棉纺织业为研究对象，既不是导师一时心血来潮，也不是他盲目服从的结果。

由于历史原因，我对武汉棉纺织厂有着特殊的经历和情愫。早在1973年前后，武汉大学历史系（今历史学院）将位于硚口太平洋路西侧的武汉市第三棉纺织厂（原荣家申新第四纺织厂）作为教学实习（那时称“开门办学”）基地，我先是与每届学生住在厂里，一面在车间劳动，一面向老工人和知情者调查访问，为撰写该厂厂史（实为“政治史”）做资料准备。继而，我奉命暂时留在厂里，作为该厂工人写作组成员创作纺织工人斗争故事《纱锭怒吼》（湖北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现在看来，这两件事都有“左”的指导思想，却有另外两件事随之印在我脑海里。

^①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现代史学会原副会长。

一是我当时了解到，历史系选择武汉第三棉纺织厂为教学实习基地，是因为1949年前武汉主要工人队伍集中在铁路、码头、人力车和纺织四个行业，前三个行业的情况不可能有较多的文字记载，而纺织厂尤其荣家企业的汉口申新四厂，不但办厂历史悠久，工厂规模大，老工人多，为武汉著名的民族企业，其保存在武汉市档案馆的资料也较丰富，作为那时历史专业的学生从事教学实习是最好的选择。至于名声显赫的汉冶萍公司，早已被同校的经济系“抢占”了。二是我当时查阅公开出版的《荣家企业史料》及其他资料时得知，由于张之洞和孙中山的先后重视，民国初期武汉兴办工业的外部环境和条件，就硬件而言，还是较优越的。不仅铁路、水路和公路运输日渐便利，而且城市改造及建设，如堤防、桥梁、码头、马路、下水道，以及街道、邮政、电报、水电、银行、商店、卫生等设施的建造，也卓有成效。更为甚者，江汉平原盛产棉花，早在辛亥革命前夕，武汉为仅次于上海的“中国第二棉花市场”。因此，申新第四纺织厂在武汉的建立不是偶然的。而且，民国初期的武汉，像申新这样大型的纺织企业还有裕华纱厂、第一纱厂和震寰纱厂。这样，当我一担任博士研究生导师，便自然想到要将武汉棉纺织业作为博士生学位论文选题，但这种选题还得视史料尤其档案资料的情形而定。申新四厂的档案内容到底怎样？武汉其他几家大型纺织厂有无档案？内容如何？就是将民国时期武汉的纺织业作为论文选题，在知识结构、理论水平和研究能力方面有无适当的研究生来做？这一连串的问题，在我脑海里不时掀起波澜。

但事情总要有个开头。2008年刘岩岩入学不久，我便提出让他考虑毕业论文选题的问题。他原就是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有一定的写作和研究能力。他说，选题最好由我确定。当时，我只是提出研究经济史虽很时髦，但难度较大，还要懂得经济学，而且资料不易找齐。没想到，他竟然说“就研究经济史，我不怕难！”我就是相信有这种决心和毅力的学生，便一锤定音，要他先将1978年来学界探索民国时期武汉和湖北经济史的概况了解一下，从中选择一个他感兴趣的研究方向；并强调近现代史研究的生命力在于新材料、新观点和理论创新，必须占有一定数量的第一手资料或档案资料。同时，还介绍武汉市和湖北省历史档案保存的具体地方，要他先去快速将经济档案（重点为棉纺织业）的目录数量及大致内容，从宏观上摸底，以求初步确定研究题目。大约一星期后，他不仅将有关研究成果列了一个较详细的清单，而且还将查阅武汉市和湖北省

档案馆的经济史，尤其是棉纺织业档案目录的详细情况作了介绍。经比较和研究后，我们初步确定选题就是民国时期武汉的棉纺织业。

凡事要抓紧，不然，一月一年的研究时间若白驹过隙，稍纵即逝。刘岩岩也感到相关资料繁杂，一卷一卷地阅读、复印或抄写，费时费力，三年时间将不够用。必须迅速确定研究的主题及重点，这就要将作为研究对象的时段和厂家尽快定下来。在厂家的问题上，已有的资料表明，在1904年前，武汉棉织厂只有一家，到1907年增至6家，到1911年增至8家，且规模均较小，无多少文字记载。1915年后，武汉才逐渐有现代棉纺织厂。1938年夏武汉会战发生后，这些工厂西迁。抗战结束后，时局动乱，迁回的工厂生产不景气。显然，研究题目范围应是1915—1938年的申新等四大棉纺织厂。而根据已收集的史料内容几经讨论，研究的主题也定在这一时期武汉棉纺织业的发展与不发展这个主线上，并从经济学的资金、技术、管理和市场四个方面来探讨棉纺织业的发展规律。

这一研究主题的重要意义在于，有关全国棉纺织史探索前人已有出色成果，后人尤其年轻学者难以超越。从人无我有、人详我略的创新角度出发，地区的或个案的棉纺织业研究，具有开创性，确为应运而生，正逢其时。再者，全国著名的荣家企业主要兴办棉纺织业以及面粉业（申新四厂的紧邻为荣家福新第五面粉厂），视民生之衣食为生产主旨，发展潜力极大，颇有战略头脑，其兴旺发达的主因就在于此。笔者选择这种研究题目，没有将经济史的研究囿于史料的收集、整理和考证，而是用一种较为严谨和有效分析问题的态度去解释作为现代工业的历史。

二

棉纺织业是民国武汉支柱产业，因之留下大量档案资料，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重要条件。史料翔实，善于运用各类史料，尤其第一手资料和档案资料，为本书的一大特色。史家重视实证，力戒无稽之谈，即所谓“无史料即无历史”。一部好的专著，还要有合理的史料结构，即史料类别较齐全，尤其核心史料不能缺少。只有一种史料，比如回忆录或报刊资料，不可能撰写准确的、全面的历史。但笔者的这一选择，是由人们过去的行动所决定的，而笔者的使命就是千方百计地去收集和挖掘这些或明或

暗的史料。历史研究尤其现代历史研究的主要困难首先就在此处。翻开刘岩岩专著的注释,我们很容易发现,除了着重引用大量的档案资料外,还有民国时期出版的有关资料汇编、著作、期刊等,以及1949年后有关的著作、地方志、资料汇编和文史资料,并参考了一些外文资料。应该说,就民国时期武汉棉纺织业来看,笔者阅读、运用的材料应有尽有,类别齐全。

笔者运用翔实史料探索武汉棉纺织业,不仅使许多叙事有一定说服力,让人可信,使一系列结论比较准确和符合实际,更重要的是,为著作提出新的见解和观点有了特殊的事实即数据的支撑。一般来说,数据是进行各项统计、计算和研究等所依据的数值。而在经济史的研究中,必须用可靠的,甚至较丰富的统计资料即数据或数据群作为研究基础。就是凭着这一点,本书制作了51幅表(含附表),其种类涉及分类表、统计表、比较表等,将错综复杂的史事按时间、类别等以表的形式列出,简洁明了,让人一目了然;并且使大量重要数据不会因叙述方式的限制而丢失,起到浓缩资料精华之作用。同时,大量数据的收集,也为有目的、有系统地采用数学和统计学方法进行定量分析奠定了基础。这就与传统的以描述为主的定性分析划清了界限。笔者运用计量史学的方法虽处于尝试阶段,但毕竟是通往成熟之路的开头。所有这些都极大地丰富了专著的内容,更是增强了本书的学术性和科学性。

结构为论文各个组成部分的搭配和排列。在主题鲜明和主线突出的前提下,从经济学的资金、技术、管理和市场几个重要方面合理安排结构,层层叙述和剖析,阐明棉纺织业发展和不发展的表现、曲折、原因和规律,是本书的又一特色。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世界范围内开始了以电气为标志的第二次产业革命。这次产业革命促进了世界经济的飞速发展,使在1901—1913年的13年中,世界工业生产量增长了66%。这一重大变化虽给后进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某种机遇,但这些先进国家凭借其强大的经济、技术力量,以及不平等条约的束缚,对后进国家的欺侮和掠夺也不言而喻。在此情况下,中国民族工业难以与西方列强竞争,其生存和发展十分艰难,位于华中地区的武汉棉纺织业也不例外。但民族工业寻求发展的道路,还可从内部机制的不断改良中得到拓展。从这一点出发,笔者在资金、技术、管理和市场四个方面描述武汉棉纺织业的发展轨迹,很有见地,是符合这

一产业的发展逻辑的。

资金是企业家在生产过程中财产、物资的货币表现。这是发展生产的最起码条件。本书以一章篇幅论述了棉纺织业资金的筹集、分配和运行情况。武汉棉纺织业在开头的若干年份，由于为新办产业，资金积累不足，周转困难。笔者从商业资本和工业资本、自有资本和借入资本、资金积累和合理分配这三对关系的不同处理方式入手，较精辟地论述了申新等四家企业解决资金短缺的多种途径。

工厂的技术应用，除机器设备的技术含量外，一般指生产中操作方面的技巧，它是生产力的重要表现。由于中国教育和科学文化落后，棉纺织业工人绝大多数来自市民和破产农民，要想对现代纺织机器设备进行熟练操作和良好保养、维修，以提高生产效率，有一定的难度。笔者对这一问题的探索，虽对技术引进的多种方式有较全面阐述，但其重点还是在技术的内化及绩效方面，这就抓住了问题的关键。因前易后难，并且技术引进的目的在于后者。笔者指出，企业引入先进技术并将其内化的过程，就是技术部门负责人和直接操作机器设备者深度消化和吸收先进技术，使之提高生产力的过程。这就要涉及管理人才和技术工人的专业素质问题。其对策就是纺织业人才的培训和使用。本书除较详细地介绍了武汉几家纺织厂开办纺织技工学校经验外，还着重说明了申新四厂的养成工制度。该厂通过考试招收年青学员，进行严格的技术培训，并负责此间的食宿和其他必要开支。并规定，学员结业后须为厂服务一年。这种做法很实惠，直接提高了生产力。申新四厂及荣家企业的养成工制度，从实际需要出发，政策易于实行，为当时中国职业教育的首创，影响深远。

本质而言，管理是科学和艺术的复合系统，其对象虽为人、物、事，但十分复杂。伴随农耕文明走向工业文明的漫长过程，从低级到高级的现代管理制度的建立极为艰难。本书大体描述了民国时期武汉棉纺织业在管理体制上由初期本土经验型逐步向西方先进的以工程师为主导的、较高级的管理型过渡的这一轨迹。在此之中，首先阐述了工头制及其改革，随后说明了较长时期维持上述新旧两种管理体制的表现和原因。与之相联系的是，本书也阐述了武汉棉纺织业管理的三种类型。一是第一纱厂和震寰纱厂长期依赖传统的商业经验来管理，未吸纳西方先进的管理经验，以致呈现某种无序和混乱的状态。二是裕华纱厂在资金融通及运转方面的管理虽然成功，但其他方面管理较乱。后来，经过一系列人事变动和规章制度建

设,才逐步走上良性发展的道路。三是申新四厂“近水楼台先得月”,成功借鉴了申新系统的较先进的管理体制,生产欣欣向荣。武汉四大纱厂虽然普遍采用了股份公司这一组织形式,但为何有如此差异呢?究其原因,管理者除具备一定的文化素养和专业知 识,以及一定的科学精神外,就艺术性而言,一个优秀的管理者,还应有强烈的研究愿望或探索精神,及时抓住管理中的不确定性因素,在判断和处理的方式上,善于变通和总结,久而久之,遂形成了较系统的管理经验。

工厂商品销量如何,决定其经济效益及兴衰,但这往往不是由价格所决定的,市场的需求程度和营销方式很重要。在“左”的计划经济时代,棉布凭票供应,纺织厂流传着“皇帝的女儿不愁嫁”这句“名言”,自有道理,但这里不同了。本书在论述武汉棉纺织业的市场竞争对手时,阐明了既要同外国在华企业的“洋货”竞争,又要同上海、无锡等东南沿海“土货”竞争的严峻形势。在此困境下,武汉四大纱厂转而向西南的湖南、四川、云南和贵州等省,采取多种营销方式开拓市场,主要在这些地区投资设厂、设立分销处、分公司和办事机构,从而上演向西南拓展市场,进一步发展棉纺织业的一幕幕话剧。这一重大转折和变化,不仅使中国棉纺织工业的分布和销售更为合理和迅速,也为 1937 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东南沿海和武汉等地工业内迁积累了重要经验,其战略意义十分重要。

三

本书研究方法有特色。翔实的史料及许多数据为实证奠定了基础,主要表现就是细致的分析和一系列表格的制作。这种分析方法,通过对反映历史过程中各种复杂数量关系之比较,提炼出新的观点或总结出正确的结论。同时,许多第一手资料或档案资料的运用,对于发现历史的因果联系和本质也非常重要。与之相联系的是,对四个纺织厂的集中而细致的考察,既是个案研究,也是微观研究。从微观来说,一个个从较小角度对历史局部的考察,综合起来,就会对棉纺织业有一个深刻的、准确的和较全面的认识。但本书并未完全脱离宏观论述,许多地方在一定程度上将两者结合起来,使之互动、互补。比较研究是历史研究最重要方法之一,本书

运用了这一方法。笔者主要对武汉四个棉纺织厂在资金、技术、管理和市场方面作了多角度、多方面的比较。在阐明武汉棉纺织业办厂模式问题上，又将武汉与上海比较。这种同类事物同一关节的比较，很容易找出它们之间的共同点、差异及高下，从而进一步认识纺织业兴衰规律。从某种意义上说，最适当的史学方法标志着与之相应的较高的研究水平。本书上述方法的运用，增强了学术价值。

南朝（宋）刘义庆在《世说新语·容止》中，有“岩岩若孤松之独立”一语。愿刘君在做好行政工作的同时，仍勤于史学研究，锐意创新！是为序。

摘 要

本书以 1915—1938 年武汉棉纺织业为研究对象，主要围绕其发展过程中的资金、技术、管理和市场问题展开论述，并对由此形成的“武汉模式”进行分析。

第一章对武汉棉纺织业资金来源和运行状况进行考察。民国时期武汉棉纺织业创建之初，很大一部分资本来自本地商人投资，商业资本在提供资金的同时，其投机性和不稳定性也影响了棉纺织业的发展轨迹。沿海工业资本在内地的投资密切了武汉棉纺织业和沿海同行业之间的联系，武汉本地的银行、钱庄和票号所构成的货币金融系统对棉纺织业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影响。裕华纱厂、申新四厂、第一纱厂、震寰纱厂在发展过程中融资方式各有不同，处理商业资本和工业资本、自有资本和借入资本、资金积累和分配这三对关系的不同方式，决定了其日后的发展趋势。

第二章论述武汉棉纺织业技术引进、内化和取得的成效。在技术引进方式上，主要通过在华洋行的代理、派人出国考察和国外厂家推销这几种方式进行。在技术内化方面则要考虑引进技术与经济社会环境、纱厂发展、生产原料和企业软实力相一致，并注重对内化结果的巩固。由于不同纱厂内部构成的差异，在技术的引进、内化和创造方面有各自特点。通过与上海等其他棉纺织基地的对比发现，民国时期武汉棉纺织业在科技运用中，由于缺乏有效的技术引进和内化机制，虽然有所发展，但是动力明显不足，成效不高。

第三章探讨西式“科学管理法”和治理结构在武汉棉纺织业中的演进和实施情况。在内部管理体制上，武汉棉纺织业经历了晚清衙门式的管理、民国初期的“工头制”，到 20 世纪 20 年代后逐步向以职业经理和工程技术人员为核心的西式管理体制转变。这两种体制在民国时期武汉棉纺织业发展过程中都发挥过重大作用，其转变过程充满反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呈现出新旧管理体制并存的二元化格局。武汉棉纺织业结合自身实际

情况选择相应管理模式，在管理人员的整顿、生产管理、工人管理、工资管理和会计制度的改革方面都取得了一定进展。申新四厂在推行科学管理的同时，还形成了极具特色的福利制度和企业文化。在外部治理结构上，随着公司制的传入，武汉棉纺织业根据发展程度和规模大小选择了股份有限公司和无限公司治理结构。

第四章考察武汉棉纺织产品同沿海产品在武汉本地市场的竞争，以及对国内中、西部市场的开拓情况。武汉棉纺织产品本质上属于对进口产品的“二次进口替代”，投入市场后，必然会对传统的商业模式产生冲击：一方面会加速武汉周边地区自然经济的解体并导致传统商路的升级；另一方面在武汉地区曾一度部分替代了沿海产品，并以长江为纬，平汉、粤汉线为经，新的商业网络和商业结构逐步形成。在市场开拓方面，武汉棉纺织品要同“洋货”竞争，上海、无锡等沿海城市的棉纺织品也深入内地，一起争夺有限的市场，并共同演绎了“市场西拓”的浪潮。“市场西拓”是武汉棉纺织业以市场为导向，因为生存发展需要，在经济规律支配下的主动选择，这和1938年因为战争而引发的“军事西迁”迥然不同。

综上所述，民国时期武汉棉纺织业既有发展的一面，又因其自身缺陷发展得不够充分，但总体上看，发展的一面多于不发展的一面，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武汉工业化进程，对武汉由传统内地商业中心向工商一体的近代化城市转变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1915—1938年 武汉棉纺织业 资金 技术 管理 市场

Abstract

This dissertation studied Wuhan cotton textile, discussed several questions of capital, technology, management and market in the development and analyzed the “Wuhan mode” based on it.

The first chapter investigated the source and operating conditions of capital of Wuhan cotton textile. At the beginning of Wuhan cotton textile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most of the capital was from the local businessman's investment. When supplying capital, the speculative and the uncertainty of business capital affected cotton textile's development track. The investment of Coastal industrial capital in hinterland strengthened the relations between Wuhan cotton textile and coastal industry, and the the monetary and financial system made up of the local bank of Wuhan, old style Chinese private bank also produced far - reaching influ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otton textile. Yuhua cotton mill, the Fourth cotton mill of Shenxin, First textile mill and Zhenhuan cotton mill had different financial method in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 which were about the relations between business capital and industrial capital, private capital and borrowed capital,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distribution, determining the future trend of development.

The second chapter expounded Wuhan cotton textile's technology import, internalization and achievement. The ways of technology import, were mainly through purchasing agent of foreign firm in China, sending people abroad to investigate and promote sell of foreign factory. The internalization of technology considered the introducing technology comply with the social environment, textile mill development, production materials, enterprise soft power, and focused on the consolidation of internalization results. Due to the differences of internal components in different textile mills, they had their own characteristics in intro-

duction, internalization and creation of technology. Compared with Shanghai and other industrial cities, due to a lack of effective technology import and internal mechanism, the technology use of Wuhan cotton textile had some development, but obviously underpowered that effect is not high.

The third chapter discussed the evolution and specific implementation of western - style scientific management and governance structure in Wuhan cotton textile. In the internal management system, Wuhan cotton textile experienced praetorium type management in later Qing Dynasty, foreman system of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and gradually transformed into western management system the core of which were professional manager and engineer. Both the two system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Wuhan cotton textile in Republic of China, and made the transformation complex, showing dualistic structure co-existence old and new management for a long time. Wuhan cotton textile chosen corresponding management model depended on its situation, and made progress in the manager's regulation, production management, workers management, salary management and accounting system reform. In promoting scientific management, the Fourth cotton mill of Shenxin formed its own unique welfare system and enterprise culture. In external management structure,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corporations, Wuhan cotton textile chosen Co., LTD and infinite governance structure according to their level of development and the size of the enterprises.

The fourth chapter inspected the market competition between Wuhan textile product and coastal products in local market, and the market development in central and west regions of China. Wuhan textile products in essence belonged to Second Imported Substitution, when input market, obviously brought about impact on traditional business model, which sped up the dissipation of natural economy around Wuhan area and led to the upgrade of trade route, and once replace the coastal industrial products in Wuhan market, and by the Yangtze river, PingHan and YueHan railway, the new commercial network and commercial structural formed gradually. In market development, Wuhan's cotton textile products must competed with foreign goods, at the same time, the product of Shanghai, Wuxi and other coastal cities also came into inland to compete for the limited market, and formed Market - Westward, which was market - oriented,

because of the survival development needs, the active choice in economic logic, and different from the Political – Westward in 1938 due to the Anti – Japanese – War.

To sum up, Wuhan cotton textile had development side, however, because of its own defects, the development was inadequate. As a whole, there was more that was development than undevelopment, which promoted the pace of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Wuhan, and had far – reaching influence on transformation for Wuhan from traditional commercial center in hinterland to a modern city with commercial and industry.

Key Words: 1915 – 1938 Wuhan cotton textile capital technology
management market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节 选题缘由	1
第二节 研究对象的界定	4
第三节 学术前史	5
第四节 研究思路、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12
第一章 资金运行与“武汉模式”	17
第一节 商业资本和工业资本关系	17
一 商业资本的消极影响	18
二 利用商业资本而不依赖商业资本	21
第二节 自有资本和借入资本关系	25
一 自有资本和内部负债	25
二 企业集团内部的资金调拨模式	30
三 外部负债模式	37
第三节 工业发展中资金积累和分配关系	48
一 官利制度的利弊	48
二 自有资本的积累	50
三 积累与扩大再生产	54
四 棉纺织业发展中的“武汉模式”	56
第四节 小结	58
第二章 技术引进及成效	60
第一节 技术引进方式	60
一 在华洋行代理	61

二	派人出国引进技术	65
三	国外厂家推销	66
第二节	技术内化	69
一	引进技术与经济社会环境相适应	70
二	引进技术与纱厂发展同步	71
三	引进技术和生产原料相协调	74
四	技术引进和软实力的营造	77
五	技术引进与内化成果的巩固	84
第三节	技术引进绩效	86
一	纱锭与产量关系	86
二	核心技术的科技效力	89
三	技术人才的作用	94
第四节	小结	97
第三章	管理体制和治理结构演进	99
第一节	工头制的演变	99
一	工头制的作用	100
二	工头制的改革	101
第二节	“科学管理”的推广和实效	103
一	管理人员的整顿	104
二	生产管理	106
三	工人管理	111
四	工资管理	116
五	会计制度改革	118
第三节	治理结构多样化	123
一	股份有限公司治理结构	123
二	无限公司治理结构	131
第四节	小结	136
第四章	“二次进口替代”和“市场西拓”	138
第一节	传统市场网络的改组和重构	138
一	传统贸易方式的衰落	138